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海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路克利 著



人民出版社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海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路克利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云河

封面设计: 汪 阳

责任校对: 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路克利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01-016281-2

I. ①海… II. ①路…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0122 号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HAIWAI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YANJIU

路克利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数: 242 千字

ISBN 978-7-01-016281-2 定价: 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批准号: 13YJC710035) 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项目“中国梦的国际话语权”
(批准号:15XNQ018) 成果

内 容 提 要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学者开创了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特色学术领域，从国际学者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研究可为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借鉴，由此，有必要考察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

本书研究了哈佛大学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背景、观点、范式和影响。考察了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分析了哈佛学者的“刺激—反应”、“铁三角”、“中国软实力论”等理论范式。

在国内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上，课题尝试做了一些新的工作。1. 尝试了新的研究点。课题研究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线索，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术史。笔者

把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统称为“海外中共学”，这在学界是一个较新提法。2. 对费正清、史华慈、麦克法夸尔等哈佛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学术范式和方法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3. 使用材料的大多数是在哈佛大学收集到的一手材料。4. 尝试了从价值观融合与冲突视角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尝试“价值观解读”，即从中西价值观冲突的角度来考察哈佛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这是一个较新的视角。

哈佛大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理念的认识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史华慈提出“毛主义论”，到麦克法夸尔的“意识形态消亡”，到裴宜理的“实用民本主义”，再到约瑟夫·奈的“中国软实力论”。哈佛大学学者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东西意识形态的交融与冲突，反映着西方价值霸权的扩张；同时，不可否认，哈佛学者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总之，哈佛大学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实用自由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学术考察，成果丰硕，反映了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冲突和交融，独具特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术思潮，是长期引领西方学界研究领域发展的典型代表。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现象的缘起与意义	1
第一节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
第二节 国内外学界对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研究 成果述评	5
第一章 “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	14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开端	14
第二节 哈佛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背景	30
第三节 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研究	49
第二章 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的研究	68
第一节 哈佛中国研究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	68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论”	72

第三章 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	88
第一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德性”	8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西文化间的“冲击与反应”	94
第四章 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性”研究	99
第一节 中国革命和理论的独立性	9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与分离	113
第三节 哈佛学者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兼容性	116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建设中的具体实现	121
第五节 哈佛学者对抗日救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系的研究	127
第五章 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和模式的研究	136
第一节 “中国革命卓异主义”与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13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道路的形成	143
第六章 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与国际毛主义	149
第一节 国际毛主义的学科起源	149
第二节 国际毛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域和研究方法	162

第七章 海外学界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	187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中国社会主义”论述的含义	187
第二节 当代西方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若干观点	201
第八章 哈佛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影响及发展趋势	215
第一节 哈佛学者研究马克思中国化的范式和方法	215
第二节 哈佛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244
第三节 哈佛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积淀 与发展趋势	262
附 录	273
学术对话	273
国际中共学刍议	302
参考文献	305
后 记	317

导 论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术现象的缘起与意义

哈佛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学术平台。该中心被西方学者如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称为“二战后中国学研究的全球中心”^①。本题对哈佛学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术现象进行考察，通过对该学派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梳理，分析哈佛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特征，探索其学术规律，把握学术动向。

一般来讲，哈佛学者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演变”，甚至是“扭曲”。本书即从这个意义上，对他们的学术研究进行考察。包括中心在内的哈佛学者有时直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sinification of Marxism 或 sinification of

^① Jonathan D. Spence, “The Passions of Joseph Needha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4, 2008.

Communism) ^① 这一术语。有时没有直接运用这一术语,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演变”是他们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实质上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本书既是对哈佛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现象和规律的探讨,也是一种学术批评。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认识是美国政府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学者尤其是哈佛学者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费正清、史华慈、布兰特(Conrad Brandt)等哈佛学者认为,“北京政权是否是莫斯科的傀儡”、“毛泽东是否是中国的铁托”、“中国人是否满意苏式道路”等问题是美国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时的“紧要问题”^②。解答这些问题绕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学界认为,二战后美国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溃败,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制定不出切实有效的对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哈佛中国学学者面对的一个深层次问题。这一问题在学术上有深度,在实践上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对华政策决策。

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代表着国际学术界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与政界和新闻界有所不同。费正清、史华慈、布兰特等人认为,“新闻界和政界对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往往是随机性的,缺乏甚至根本没有历史分析基础”^③。为此,学界从历史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哈佛学者群。

① 哈佛大学学者的学术作品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术语高频率出现,“共产主义中国化”、“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也曾出现多次。

② Conrad Brandt, John King Fairbank, Benjamin Schwartz,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Atheneum, 1971, p.11.

③ Conrad Brandt, John King Fairbank, Benjamin Schwartz,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11.

第一节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哈佛大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在西方学界的反映,是西方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共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窗口。费正清早在1948年的专著中就认为,“美国人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评价认识,一定会受到我们对一般性共产主义尤其是俄国共产主义认识的影响”^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东西方学术界近百年来所关注的重大课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西方学界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代表性学术机构。中心成立55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对该中心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完成这项梳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有助于深入了解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识。西方中国学和中共学研究学者非常重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他们认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中,没有什么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纽带的理解更为重要”^②。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被哈佛学者列为重大理论问题。对哈佛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有利于深入、系统地认识西方学界对中共

①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62.

② Conrad Brandt, John King Fairbank, Benjamin Schwartz,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 11.

意识形态的认识。

2. 有助于增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①。哈佛学者的学术作品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主义中国化”、“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等相近相关的问题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哈佛学者从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有利于促进我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学术的国际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该研究将有利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课题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3. 有助于驳斥西方学界“中国意识形态消亡论”等错误论调。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消亡。他提出,“邓小平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运动使得意识形态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空间”^②。由此,他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甚至得出了“中国政治体制脆弱论”。西方学界否认中共当下意识形态的学者不在少数。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4. 有助于借鉴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和价值观。由于西方学界和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缺乏认识,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尊重。而“美国人一向信任专家,他们对中共政权的理解是通

①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5月,第22页。

②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2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

过中国研究者的解释而得来的”^①。而且，哈佛学者的研究对美国公众的影响较大。尽管如此，不可否认，哈佛学者的研究不乏可资借鉴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了解西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有利于开展跨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进一步增强我国学界在国际学界和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课题上的话语权，同时吸收先进文明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②，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哈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种种观点，其中不乏责难、批评，也有较为中肯的建议，可资借鉴。

考察哈佛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成果，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认识，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参考，更加自觉地加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希望通过本书的论述，可进一步增进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总之，哈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探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学界对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哈佛大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率先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了“毛主义”理论，开启了国际学术界旷日持久的“毛主义”大

① [美] 余英时：《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序言。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讨论。这些大讨论本身既是新的探讨，也是对哈佛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一、国际中共研究和国际中国研究学界的反应与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哈佛大学学者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毛主义”理论，认为毛泽东发展了一套独立的中国革命理论和战略。这一“新理论”与马列主义原理不同，是“异端”。一石激起千层浪，“毛主义”理论在国际中共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后引发了 5 次以上的学术争论。这些是对哈佛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同时该领域的研究也在争论中不断深入发展。

（一）有关毛泽东思想原创性问题的学术讨论实质上是对包括哈佛大学学者在内的海外学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反思与总结

20 世纪中叶，美国学界开始深入讨论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主要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问题展开，新的研究成果自此不断涌现。其中有多次较为集中的学术辩论，分别由《新领导》、《中国季刊》、《共产主义问题》、《近代中国》4 家政论和史学杂志召集，时间跨度近 20 年。

1959 年 7 月，在美国社会主义协会主办的《新领导》杂志上，发生了第一次讨论，主要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共发表了 3 篇论战文章。第二次讨论是在 1959 年，《中国季刊》的首任主编麦克法夸尔敏锐地发现了史华慈和魏特夫在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上的尖锐对立，邀请他们在《中国季刊》上围绕“毛主义的原创性”^①这一问题继续

^① Roderick MacFarquhar, editor's note, *China Quarterly*, No.1, Jan-Mar, 1960, p.72.

深入展开学术辩论。第三次讨论是在1966年5月,以“毛主义”为题的学术辩论在《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再次上演。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是‘毛主义’”。参与讨论的有施拉姆(Stuart Schram)、柯亨(Arthur A.Cohen)、史华慈等多位学者。这次讨论先由编辑部邀请施拉姆和柯亨就有关“毛主义”的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请史华慈等人评论,而后施拉姆、柯亨等又答复。第四次辩论是在1976年10月,“文革”即将结束之时,《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主编黄宗智(Philip C. C.Huang)在该刊又组织了一次关于“毛主义”的学术辩论。这次讨论规模巨大。史华慈、施拉姆、魏昂德(Andrew Walder)等12位著名学者参加,发表了15篇论文和评论。这些争论都有哈佛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史华慈参加。很多学者在辩论中研究了哈佛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或批评,或赞同。这些争论本身是总结,又是新的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 其他有关哈佛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论述

1. 对哈佛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观点的研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专著《中国共产党:弱化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美国学者主要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者一派,如麦克法夸尔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已经毁灭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尊重,而正是这个意识形态为党提供了合法性和凝聚力”^①。悲观派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行了。

①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61.

乐观派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发展来看，虽然曲曲折折，但是共产党却从内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和苏共在 80 年代末的境遇很不一样。乐观派认为中共可以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乐观派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的解体、“颜色革命”以及其他民主政体的研究超过了外界揣测。沈大伟属于乐观派，认为中共正在赢得民心，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识形态运动”^①：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

2. 对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的研究。傅高义认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开创时期就是“温和的冷战斗士”^②，基本上是敌对共产主义的。裴宜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中国学研究 50 年》中分析认为，早年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是出于一种“冷战心理”，“要了解敌人”^③。当然，战后 70 多年来，哈佛大学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时代背景随着时代发展有所不同。这里的中国研究，包括对中国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早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薛龙（Ronald Suleski）《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50 年学术史（1955—2005）》（*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① David L.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111.

② Ezra Vogel,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Marginal in a Superpower*,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tudies: papers rea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commemorate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its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in June 1993,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1994, p.189.

③ Elizabeth Perry, *Partners at Fifty: American China Studies and the PRC*, Washington: Paper for conference on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1999, p.13.